

试论五凉时期佛教在凉州地区兴盛的原因及影响

张辉军

(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 武威 733000)

[摘要]起源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最早兴盛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特别是五凉时期,佛教在河西地区,尤其是在凉州一带始终受到人们普遍尊崇和信仰。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五凉时期佛教在凉州地区兴盛的原因作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凉州佛教对日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作一探讨。

[关键词]五凉时期;凉州地区;佛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2-0010-02

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宗教。自诞生后,这一宗教不断向外传播,并逐渐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演变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

汉代以来,佛法东渐。由于其蕴涵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和无穷的大智慧,佛教逐渐在华夏文化的土壤找到了切入点,从此扎根发芽,得到了迅速持久的发展,最终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河西走廊,是沟通中原和西域的交通要道。中原的丝绸、茶叶、瓷器等通过这里走向了西域诸国,同时也将西域佛教文明的曙光引到了中原大地。地处河西走廊东端重镇的古凉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原和西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曾经起到过枢纽和货运中转站的作用,佛教文化亦是如此。从西域传来的佛教,从河西走廊的凉州,二次辐射到了中原各地。因此,河西走廊的古凉州可以称作佛教的第二故乡。东晋十六国时期,在河西走廊先后有五个割据政权出现。它们势力所及大体相当于以往凉州管辖的范围,后世分别将它们称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和西凉,简称“五凉”。除西凉外,其他四凉均定都凉州。五凉时期,凉州地区的佛教传播已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佛教传播及评述活动相当活跃,民间纷纷建塔立寺以表明虔诚热烈的信仰,佛教教义日益深入人心,有“世信佛教”的传统。

一、五凉时期凉州佛教兴盛的原因

首先,凉州为东西交通必经之地,五凉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凉州佛教的发展。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端,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自古就处“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于咽喉”的战略地位,汉武帝攻破匈奴、设置河西四郡、经营西域之后,陆路交通十分畅通,商业贸易兴旺发

达,使者来往非常频繁,为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佛教入华,或由西域僧人东来传教,或由中土僧人西行求法,这一时期必经凉州。因此,凉州成为中西文化交融和中转的据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因而也就深深打上了凉州文化的烙印。不仅西域高僧首先要驻锡凉土,熟悉华语,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如鸠摩罗什、昙无讖、觉贤、昙摩密多、师贤等,译经授禅,当时及后世均倍受称道;而且中原的佛经传播、禅法戒律的流行,也直接受益于凉土,如道安在襄阳所获《光赞》等四经,传至南方的《涅槃》,蜀地、江南乃至北魏盛行的禅律等都是如此。这一时期,凉土僧人西行求法、东下传道者人数之多、作用之大、影响之巨,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其次,凉州偏安一方,环境相对宽松,为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条件。十六国时期,南方的东晋王朝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北方更是混乱不堪,到处战乱纷争,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文人僧侣居无定所,文物典籍惨遭破坏、流失殆尽。惟有偏居一方的凉州地区,社会比较安定富足。因此,南方、北方及中原的一些文人学士、宗教僧侣纷纷涌入凉州避难,而西域诸国的使者及文人僧侣乃至中亚地区的僧徒,又纷纷经过或驻足凉州,从而使五凉政权统治下的凉州成为当时本土文化、宗教文化、东西文化交融、汇合的生成地,客观上促成了凉州佛教文化的传播、发展和繁荣。

再次,五凉政权的统治者大都崇信佛教,促进了佛教的繁荣兴盛。五凉的统治者皆非正统建号,他们为了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纷纷借助宗教,特别是利用佛教神化其统治。

前凉张轨信奉佛教,张寔继其父大业后,也以佛教为国教,广招名僧,建寺译经,使凉州有了“世有佛教”的记载,从而繁盛一时。后凉吕光请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来凉州

译经传长达 17 年之久。各地僧人慕鸠摩罗什大名前来拜访和求教者络绎不绝,西域和中原高僧也常来凉州交流学习。一时间,凉州信奉佛教、翻译佛经蔚然成风。北凉统治者沮渠氏对佛教更加笃信崇拜,邀请名贯西域、号为“大咒师”的著名高僧昙无讖在凉州主持大规模的译经活动,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佛学翻译家。据统计,北凉公元 401~439 年,译经数比其余四凉总和还要多,使当时的译经传经、活动达到了高潮。除拜僧译经外,沮渠蒙逊还在凉州南山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凿窟造像活动,使河西石窟林立,居全国之冠。

随着佛事活动的兴盛,凉州境内也出现了不少高僧,如竺佛念、智严、宝云、道泰、道朗、慧崇等,加上大量寓居或过往僧人,他们跋涉西行,携经回国,聚众弘法,从事译著,使凉州成为当时中国禅法最盛之地,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兴盛,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后,凉州为多民族杂居之地,各族群众为摆脱苦难,寄希望于佛教,促使佛教传播兴起。凉州作为边塞地区,古时民族成分复杂、众多,胡汉杂居,传统的一元文化格局根基不固,又是佛教东传必经之路,所以非常有利于佛教的传播。加之佛教经西域传到内地后,其内容大多宣扬“众生平皆苦”、“轮回报应”等思想,可以使下层深受压迫苦难的各族百姓能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者的奴役。饱受战乱之苦的各族群众又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佛祖的身上,他们渴望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认为只有佛教才是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佛教在凉州地区得以迅速传播和兴起。凉州及河西一尊又一尊神秘大佛的出现及雕塑、绘画、建筑、书法(写经、石刻)艺术的同步发展,既是五凉时期凉州佛教兴盛的实证,也推动着凉州佛教及五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二、五凉时期凉州佛教的传播及影响

自五凉时期兴盛起来的凉州佛教,千百年来经久不衰、广为传播,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成为五凉文化甚至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凉州也是沟通中原和西域的交通要道,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融合与发展。特别是十六国后,在佛教向中原的传播和推广中,凉州佛教完成了向南线和北线的大转移。

西晋以后,凉州至江南的交通,多经巴蜀、江陵。由于凉州僧人的南下,巴蜀、江陵、建业成为禅法流行的区域,

特别是蜀地,接近凉州,禅法甚盛。凉土僧人贤护、法绪于永嘉之乱后即至蜀,法成等于刘宋时至蜀。京兆人智猛,西行求法返至凉州,停留 10 余年,译出《泥洹经》20 卷,后于永嘉十四年(320)自凉入蜀授禅。在建业,由于觉贤南下(约 410),禅法得以弘扬。觉贤、智平、宝云在建业各有译经的记录。觉贤参与或独立译出《僧祇律》40 卷、《泥洹经》6 卷、《华严经》50 卷,还有《文殊师利发愿经》等;智严、宝云共译《普曜》、《四天王》、《广博严净》三经;宝云还独译了《无量寿经》、《佛本行赞》等。经书北凉灭亡后,沮渠京声南奔刘宋,在建业也译有禅经。

北魏灭北凉后,统治者派遣凉州著名高僧昙曜、师贤等及 3 万多户凉州工匠到北魏都城山西平城开凿云冈石窟,他们之中很多是开凿了天梯山石窟的工匠,他们带到平城的除经卷、锤子、凿子外,还有大量佛教经典和历史文化典籍。北魏将都城南迁洛阳后,开凿了云岗石窟的僧侣、工匠又随之南下,将佛法带到了洛阳,为北魏统治者开凿了后世称之为“世界十大石窟寺”之一的龙门石窟。从此,凉州僧众和凉州佛教文化在之后的百年间迅速渗透到了广大中原地区。由凉州到平城的玄高、慧崇、昙曜、师贤,对北魏佛事的影响很大。玄高在凉州即受沮渠蒙逊父子恩宠礼遇,入魏后又受太武帝敬重,太子晃事玄高为师;慧崇作了尚书韩万德的老师;师贤在文成帝即位后任道人统;昙曜为太子晃知礼,后继师贤任北魏沙门统,掌管北魏全国的宗教事务。可见,凉州僧人的地位十分显赫。

凉州佛教文化不仅完成了在中国南线、北线的传播,而且对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了一种文化上的融合之风,使佛教艺术达到了真正融洽。正如日本学者长泽合俊评价所说,凉州的佛教文化深受犍陀罗美术的影响,创造出了绚烂的佛教艺术,然后由北凉的工匠带到云冈,这一佛教美术史,基本上概括了佛教东传的全部历史。正是由于凉州僧众、学者对佛教的传播和推广,使佛教在中原和江南一带能够迅速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对北魏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不仅加速了以鲜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同时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独特凉州文化为后来的隋唐文化奠定了基础,成为隋唐盛世各种典章制度的主要渊源。

[参考文献]

[1]赵以武.五凉文化论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2]乔高才让,李占忠.凉州佛教[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3]郭承祿.武威史话[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